

民俗事象的文化含义^①

——以现代乡土小说为解读文本

姜 峰

(北京教育学院 中文系, 北京 100120)

摘 要: 某种物事一旦进入传统习俗之中,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 其社会承载就会自然增加。从文化审美意义上看, 在现代乡土作家笔下, 民俗既是人物具体活动的背景, 又是人物行为的心理渊源: 喝年糕汤, 吃烙饼, 吃讲茶, 这些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凝固的物质民俗具有强大的文化功能。现代乡土文学家们思考的是中国人应该如何从文化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过一种更健全、更正常、更合理的生活, 因此在小说文本中得到展示的民俗事象的文化含义就在于其深刻的历史批判意识和反思色彩。

关键词: 民俗事象; 文化含义; 乡土小说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1)01-0129-04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Folk - Customs Things and Phenomenon

——From Modern Native Novels Version

JIANG F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Beij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Beijing100120)

Abstract: Being a kind of cultural sign, the society loading will be naturally increased once some certain thing has gotten into traditional custom. From cultural aesthetic sense, folk - customs are both background figures of specific activities and also behavioral mental origin of the person in the modern native writer's novels. New Year's pudding soup, pancake and stating - tea, these customs with more concretionary material in the reality of people's life have strong cultural function. As for the age of folk on display, what the modern local literature writers think of is how the Chinese people get away from this kind of culture's deep shadow and live a sound, more normal and more reasonable life. So it has profound critical consciousness of history and reflection flavor of culture by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folk - customs things and phenomenon.

Key words: folk - customs things and phenomenon; cultural implication; folklore affairs

民俗中有陋习恶俗, 而更多的民俗事象呈现出中性色彩, 很难从道德、伦理、科学等方面对之进行简单分析和评价。作家对这些民俗事象的描写, 用“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 或者炫耀他的眼界”时, 显示出乡土文学的写实风格。对于特定风俗中人的现实行为的描写, 多数现代乡土作家态度是一致的, 都采取了较客观的立场。不论是注重风俗, 还是强调人物, 都将中国近现代背景预置其中, 不

仅使风俗的展示排除了对地域风情的简单猎奇, 而且使人物活动在这预置背景的映照下有了特定的文化含义。

民族文化、民俗涵养, 陶冶了作家的人格、气质和心灵, 再通过受感染的心灵和独特的审美意识去观照民族文化、描写民俗, 双向的能动作用使情形变得复杂, 进入作品中的民俗经过作家的选择和改造, 有认同有变异。几乎可以说, 凡是进入小说中

^① 收稿日期: 2010-07-15

作者简介: 姜 峰(1972-), 女, 湖北荆州人, 北京教育学院讲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的民俗事象,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形。民俗在作品中的变形程度,往往受民俗事象伸缩程度和作家对其意蕴的理解程度的影响。

一 物质生活民俗

一般来说,物质生活方面的民俗,如房舍与饮食,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凝固,它进入文学作品时与现实生活也大体一致。即便如此,作家也会根据作品结构的需求加以剪裁,有详有略,并非纯自然主义的描绘。鲁迅的《离婚》写爱姑与丈夫的离婚纠葛,仲裁的地方是庞庄头面人物慰老爷家,参与仲裁者除慰老爷,还有势力更大、地位更高的七大人。仲裁时先“喝年糕汤”,所以爱姑“喝完年糕汤,知道时机将到。”仲裁过程简单、平和,但透着仲裁者的威风 and 杀气。这种仲裁方式展示出封建统治势力的强大和封建文化的积习深厚。至于涉及人生里程的重要民俗事象,如婚丧礼仪、信仰习俗等,在作家笔下更注意其取舍,或强调,或淡化,总是要为作家创作意图、哲学思想服务。《烛焰》中翠姑的父母嫁女时见到烛焰突熄的那种涌自内心的恐惧,传达出风雨飘摇中挣扎的脆弱民族心态。《拜堂》中的神圣仪式冲淡了主人公的负罪感,从反面揭示出传统文化的可悲可怜。

在食事描写中,具有地方特色同时也最富社会性内涵的,当推赵树理笔下有关“吃烙饼”的描写。在山西某些地区,烙饼是一种特殊之物。吃烙饼,可用于社会交往、民间结义的仪式中,《盘龙峪》中春生几个青年结拜兄弟,就是通过吃烙饼来进行的。吃烙饼有时也是贫富阶层的等级标志,如《李有才板话》中写的“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有时,吃烙饼还代表了某种特权,甚至成为某种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当《李有才板话》中的小顺称农会主席是“吃烙饼干部”时,其中包含的讽刺大概相当于当今人们所谓的吃喝干部之类。作为待客的延伸,要请有身份的人帮助说理,判定曲直是非,也得请吃烙饼,这就成了一种乡俗,吃烙饼说理的仪式也非常正规。赵树理在《李家庄的变迁》中对此作过具体的描述:铁锁与村长的侄儿发生纠纷,由恶霸村长在龙王庙里主持仲裁,仲裁时要“吃烙饼”,并让因村长偏袒而输理的铁锁负担吃烙饼的费用;村长仲裁时,从审案的场面格局,到角色程序都相似于古代衙门判官审案。^[1]凝重、愚妄,显示出生长于中原农耕文化,讲究王威与秩序的社会文化心理。烙饼在这里其实已不是作为单纯的食物,而成了一种与传统乡俗联系在一起的符号。某种物事一旦进入传统习俗之

中,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其社会承载就会自然增加。因此,区区烙饼,在晋东南一带,具有了非常强大的功能。

与烙饼所扮演的角色有些类似的还有四川地区的“吃讲茶”。历史上,四川盆地是最早发现和食用茶叶的地区。“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饮茶成为当地人生活中普遍的习俗,几乎每个乡场都有或大或小的茶馆。在四川任何城乡村镇,茶馆随处可见,它是人们娱乐聚集的场所,也是交流信息沟通情感的地方。民间出现矛盾纠纷时,仲裁调解的地方也选在茶馆,谓之“吃讲茶”。四川有句俗话:“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吃讲茶”含有用茶敬客、讲开算数的意思,这种颇具人情味的习俗有利于缓解双方的矛盾和纠纷。按民间习俗,“俗遇不平事,则往茶肆争论曲直,以凭旁人听断,理曲者则令出茶钱因为罚”。那么吵吵与方治国在其香居茶馆“布置好一台讲茶”,双方各带几个场面上的人助威,参与评理调教,先讲理,讲不通理则动手。这种民间仲裁形式,没有摄人的威力,更多的是双方协调或争斗。行为上先礼后兵,先文后武。反映出川人既受礼教文化影响,以礼为重的一面,又具僻处内地尚存蛮习之处。在无讼的乡村,“吃讲茶”也揭示出乡村官绅沆瀣一气的现实。沙汀通过其香居茶馆里的一场讲茶,把乡村基层政权的把持者方治国与刑么吵吵们假抗战之名行一己私利之实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不论是讲茶过程中的相互攻击,还是讲茶后的彼此勾结,其实质都是鱼肉乡民的鬼把戏。

“人命两家穷”,“冤死不告状”,是百姓世代积累的痛苦经验。民间如果发生矛盾纠纷,往往依靠家族、宗族或地方内部的仲裁调解。中国文化的根本是家族化的宗法制,“法治”的威力远远赶不上“德治”文化的影响。这里面涉及到地域性的多种文化因素——仲裁的方式、仪礼、心态、规定等,而这些文化因素就构成仲裁或惩罚方式的文化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由文化生态系统、人文传统、社会条件、时代气候等决定:“吃讲茶”的民俗,是蜀地悠久的茶文化对人们行为习惯长期影响的结果;“喝年糕汤”与江南盛产稻米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浙东尚礼教、好仪礼的人文社会环境有关;“吃烙饼”因晋处中原,农事发达,是中华文化的内核区,日常行为习惯离不开农业文化、面食文化的联系,它们都是在各自特定的文化土壤上形成的。即使渗透了封建文化毒素的过错惩罚方式,也带着不同地域的文化胎记:孔乙己偷书,受到的惩罚是挨打,最严重是打折了腿;骆驼(蹇先艾《水葬》)偷东西,受到的惩

罚古老又残忍——水葬,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比起孔乙己,骆毛遭受的惩罚更无人性,更具贵州边地远离文明的蛮荒特点。这些民俗,从现代社会意义上看,体现在不同地域里,金钱与社会强权势力对社会公正的垄断手段或对民俗行为的制约机制;从文化审美意义上看,反映了不同文化生态系统中,人们独特的生存方式、行为的不同典型环境和文化心理,以及各地文化特质的区别。

二 精神信仰民俗

作家们对风俗的展示过程中,始终受制于理性批判力的约束,这点从作品描写的冷峻色调和悲剧性结局上尤其看得清楚。许杰的《惨雾》写村仇械斗,景象十分野蛮惨烈,双方所为只是“希求有最好的上风名誉”,那只是毫无价值的老中国儿女所注重的面子,更可悲的是这风俗作为生活一部分已渗入乡民心中,视之为天经地义,听到锣声,人们如同着魔一般,个个表现出病态般的亢奋,封闭的乡村文化最终导致了生命的退化和文明的返祖,反映出旧中国农民可怕的愚昧、自私。蹇先艾以现代理性反观贵州内地生活,发现了这块乡土上原始风俗与世态的残酷野蛮,《水葬》辛酸地诉说了一种冷酷的古已有之的野蛮风俗。这些野蛮的风俗和昏聩畸形的心理使整个宗法制农村笼罩在阴暗凄凉的悲剧气氛中。萧红的《呼兰河传》中,跳大神是造成小团圆媳妇死亡的愚昧而残酷的历史众数和力量之一,是呼兰河小城芸芸众生愚惰的参照物和显示物。端木蕻良的《大江》揭示出跳大神的虚妄性和荒诞性,意在说明偏僻乡村的东北民众对已经降临的民族灾难尚浑然不觉,而犹自沉溺于虚妄之中。茅盾的《春蚕》涉及大量如蚕花太子、收蚕仪式、避白虎星、大蒜占卜吉凶等关于养蚕的民俗礼仪和原始禁忌,于庄严神秘的民俗色彩之中解剖蚕农们顺乎天命、迷信盲从的文化心理。与上述批判情形不同的另一类风俗描写,是挖出事件结局滑稽性与风俗严肃性之间的悖谬,形成尖锐的反讽。《怂恿》中政屏在牛七的怂恿下演出一场闹剧,讹诈目的未达到,反让妻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别人以抢救为名戏弄了一番,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闹剧结束后的尴尬,构成对牛七一伙恶劣心态的痛砭。《菊英的出嫁》展示的冥婚更为荒唐,人死后为鬼隆重婚配的这一东方文化奇景,从乡民的集体心象中透视出乡土中国远离现代文明的原始闭锁。

在现代理性引导下对民俗事象的审美开发,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人们对风俗传统的肤浅认识,而将民俗当作某种实实在在的、有着丰富历史内容和自

身变化规律的文化实体。在乡土作家笔下,民俗既是人物具体活动的背景,又是人物行为的心理渊源;人物行为不仅构成对具体风俗的动态说明,同时又是风俗的一种载体。人与风俗在审美世界里共存,又外化了主体对某种文化心态的深切认识。

三 岁时节日民俗

巫文化从宫廷到民间、从中心到边缘的历史流向,为中国文学与巫风的结缘提供了一个必然的契机,二者的关系呈现出鲜明的缘性特征:

昔楚国南郢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突绪,托之风谏。^[2]

因此,沈从文喜欢把神巫当成有七情六欲、并不高明的普通人来写,以突出他们的可爱。《道师与道场》中的两个巫师,做神事而不忘人事,在事神的同时,也满足自己的欲望。这种亵渎神灵的行为,沈从文以幽默的口吻讲出,对其做法虽有些微的嘲讽,立意却在主观现世享乐上。《阿黑小史》中,巫师被尊称为师傅,他被阿黑的父亲请来做法事,五明胡乱指一处,师傅就“样子一凶,眼一瞪,脚一顿,把一个鸡蛋打去,鬼俨然就被捉了”。沈从文对行巫者的效力并不相信,故在小说中叫这巫师老骗子,此话一方面指出其虚假之处,另一方面也并无恶意,作者其实很欣赏巫事活动的民俗价值。跳傩或是还傩愿,是湘西少数民族中最为盛行的巫术活动,它与一般巫事活动有区别:一般的巫事活动是个体行为,直接与功利目的挂钩;跳傩或还傩愿则是群众广泛参加的集体活动,场面大,节目多,手续繁复,同时还行使节庆娱乐的功能。《湘行散记》写乡间酬神还愿的情景:

(锣鼓)声音所在处必有火燎与九品烛照耀争辉。炫目火光下必有头包红布的老巫师独立作旋风舞,门上架上有黄钱,平地有装满了谷米的平斗。有新宰的猪羊伏在木架上,头上插着小小五色纸旗。有行将为巫师用口把头咬下的活生公鸡,缚了双脚与翼翅,在土坛边无可奈何的躺卧。主人锅边则热了满锅猪血稀粥,灶中正火光熊熊。^[3]

《神巫之爱》对跳傩宏大场面的诗意描写,更有魅力,那如诗如画的乡戏场面,“木匠、泥水匠、屠户、成衣人,无不参加”。^[4]《长河》最后一章是“社戏”,它不是乡间演出的普通地方戏,而是傩戏。沈从文知晓傩戏表演作为民间巫事活动的象征意义,故把它安排在最后,用意是请神护佑湘西人免受外来灾难的打击。《凤子》也细致描述了傩舞和傩戏

的全过程。傩戏本身的娱神色彩都十分淡薄,主要在娱人。

借事神以娱己,民间的祭祀活动因此常常演化成当地的节庆活动。“农人耕稼,岁几无休时,递得余闲,则有报赛,举酒自老,洁牲酬神,精神体质,两愉悦也。”^[5]报赛活动对农人而言,既是一种酬神的活动,更是一种自我愉悦、宣泄情感的方式,“所以人们都穿戴得齐齐楚楚,打扮得漂漂亮亮”,倍添一种乡间的欢乐气氛。胡正在《七月古庙会》中对报赛活动的描述,既再现了乡间庙会的盛况和乡民们对于庙会的热情,同时也传达出作者对此的由衷赞赏。铺张的描写,足见作者的一种情趣。

从乡土文学作品所展示的岁时民俗行事过程来看,在乡间,诸如元宵、中元等源于敬神信巫的赛醮活动,其实已逐步脱离了这些节庆原先的含义,变成乡村人民自娱的一种重要形式。下层人民对于生活的热情,在岁时节庆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也正是在这些节庆中,包蕴了人们无数的期待、愿望和美好的回忆。因此,人们对节庆的重视,更主要是体现了一种生活的态度以及作家自己的浓厚的生活情趣。

四 民俗事象的文化含义

传统和习俗“是由血缘或地缘群体成员的代际继替积累而来的,又是为乡土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作为一种精神遗产所接受”,^[6]由此形成一种惯于向后看的积习和因循保守的思想倾向。现代乡土作家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用科学理性的态度审视各种民间习俗是他们共同的思维定势。“时代精神底反映,即是一时代风俗习惯底反映:不过时代精神是宿藏于人们心中深奥处的,风俗习惯是表现于外面的,有这样的不同罢了。所以描写时代精神,同时必须描写那时代底风俗习惯人情等表面的状态。如一时代底婚嫁礼节、会餐、衣服装饰、宗教、迷信、道德以及其他地方底建筑房屋和特具的习惯……等,都是应该详细研究的”。^[7]孙俚工所意识到的这种民俗在小说艺术建构中的作用,可以代表现代乡土作家对民俗的一种普遍看法。

鲁迅曾呼吁有志于文化革新和社会改革的人们“必须先知道风俗和习惯”,“因为倘不清,就无从改革。”^[8]他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一般人文化审视的眼光,往往过多地重视那些可以用现成理论来分类、界定的思想意识。而忽略了更为丰富复杂的、以民俗文化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亚思想意识,其偏颇,足以使较新的改革也“著著失败,改革

一两,发动十斤”。这种呼吁,得到了积极的响应!东北作家群那大段、精彩的跳神场面和过程的描绘,客观上展示出这一民俗活动的神秘荒诞性及其现实合理性,表明跳大神在民众文化心理结构中所占的位置与比重。从山药蛋派作品对民俗的展示来看,作家们也深入到了民众之中,充分研究、解剖了他们的风俗和习惯。而且,于存于废都有所思考:对于奢靡的婚娶礼俗,他们不仅通过民俗展示显示其弊端,还进而揭示其与山西特殊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的关系,从而提出要从根本上废除婚姻陋俗,必须使广大乡民真正从贫瘠的生活状况中解脱出来;对于诸如求雨、拜神等民间迷信,作家在对其嘲讽、批判的同时,也多少分析了它们得以产生的根源;对于那些充满乡间生活情趣、给人们带来身心愉悦的赛会、演戏等民俗活动,则以一种特有的热情努力加以弘扬,并对那些无理取缔的行为给予批评。毫无疑问,民俗蕴藏于民间社会生活习惯中,它涵容了一个民族的最广泛的传承文化事象,是构成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积淀着人们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的精神因素和心理因素。沈从文描摹乡风民俗的意义,与其说是文学性的,不如说更是文化性的,他将湘楚巫风、民间娱乐和山乡风俗与青年男女对健康本能的追求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民俗承载着一种盎然的生命情趣,凸现出自然人的昂扬生命。

现代乡土文学家们在展示民俗文化的同时,思考的正是中国人应该如何从这种文化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过一种更健全、更正常、更合理的生活,因此具有深刻的历史批判意识和文化反思色彩。

参考文献:

- [1] 和振荣.“吃讲茶”与“吃烙饼”[J]. 晋阳学刊,1991(4).
- [2] 王 逸. 楚辞章句[M]//洪兴祖. 楚辞补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 沈从文文集:第9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47.
- [4] 沈从文文集:第8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51.
- [5] 鲁迅全集:第8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0.
- [6] 周晓虹. 传统与变迁[M]. 北京:三联书店,1998:57.
- [7] 孙俚工. 小说作法讲义:第3章第11节[M]. 上海:中华书局,1923.
- [8] 鲁迅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4.

责任编辑:黄声波